

# 郑和同僚王景弘在福建的生平事迹考察

梁 青·吴 光辉

## An Investigation of the Life Stories of Zheng He's Colleague Wang Jinghong in Fujian

LIANG Qing, WU Guanghui

Research on Wang Jinghong, the principal imperial envoy who accompanied Zheng He on his voyages to the Western Oceans, has drawn increased attention in Fujian's regional research community. Nonetheless, there remain many doubtful points in "Wang Jinghong in Fujian" as a topic of research. As such, this research group carried out anthropological investigations in Zhangzhou and Quanzhou. With the findings from these investigations, this article sheds light on Wang Jinghong's birthplace, travels, sacrifices and temple issues, and evaluates his historical status.

Keywords: Wang Jinghong, Fujian, Life Stories, anthropology

关键词：王景弘，福建，生平事迹，人类学

### 序言

以唐纳德·F·拉赫 (Donald F. Lach, 1917-2000年) 的《欧洲形成中的亚洲》(*Asia in the Marking of Europe*, 1965-1993年, 中文版: 人民出版社, 2013年) 系列著作、唐纳德·基恩 (Donald Keene, 1922-2019年) 的《日本人的欧洲发现》(*The Japanese Discovery of Europe*, 1952年, 中文版: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7年) 的出版与流行, 亚洲人的欧洲认识、西洋认识或者说“越境”研究, 尤其是针对新殖民主义思维的批判性研究成为了如今被广泛关注的课题之一。在这一背景下, 如何评价郑和下西洋这一事实乃至与之相关联的一系列人物事件, 进而包括郑和的同僚、正使<sup>1)</sup> 王景弘的研究也得到学术界的关注。

王景弘, 福建人, 生卒不详, 明洪武年间 (1368-1398年) 入宫为内官监宦官。在郑和奉命七下西洋的过程中, 王景弘几乎都与之同行, 亦曾担任远航通番正使。郑和船队经东南亚、印度洋, 到达红海、非洲东海岸, 遍访亚非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晚年, 王景弘在南京编著了《赴西洋水程》《洋更》等航海手册。

---

1) 徐晓望在《八次下西洋的王景弘》(《海交史研究》, 1995年02期) 中指出王景弘是与郑和并列的正使, 这一观点现已被学界接受。

1945年，为了纪念王景弘的历史功绩，中国政府将南沙群岛一座小岛命名为景宏岛。时至今日，王景弘依旧在东南亚享有崇高威望，遗迹多达30多处。文莱国首都斯里巴加湾市为了纪念王景弘，专门将一条繁华大道命名为“王总兵路”。

不过令人感到遗憾的是，迄今为止王景弘的研究可谓是凤毛麟角，尤其是《明史》未曾为王景弘立传，只是留下了行事活动的零星记录。而今，作为地方文化研究之一，漳平市委开始编辑王景弘研究的论著。2003年，福建省国际文化经济交流中心与漳平市政协联合编印了《明代大航海家王景弘》（漳平文史资料总第27辑），这成为首个王景弘史迹文史资料专辑。2004年10月，漳平市与福建省社科联联合撰写了王景弘的年谱；12月，漳平市与福建省国际文化交流中心合编《王景弘与郑和下西洋》。2005年6月3日，漳平市王景弘研究会正式成立，标志着王景弘研究进入了一个新阶段<sup>2)</sup>。这一阶段的最新成果也就是该会出版的《王景弘研究》（海洋出版社，2019年）一书。该书提示了王景弘出使西洋的史实与评价，挖掘论证了王景弘的籍贯家世、宗教信仰与文物遗迹，提到了王景弘文物遗迹的海外遗存与历史文学之中的人物形象，为王景弘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全景式的参照<sup>3)</sup>。

与这样的专门研究相呼应，围绕王景弘下西洋的丰功伟绩，也出现了一系列著作与论文，陈贞寿《纵横驰骋越重洋——郑和王景弘七下西洋》一书全面剖析了郑和、王景弘七下西洋的历史事件，展现了七下西洋对于中华文化整体发展产生的巨大影响<sup>4)</sup>。王晓云《王景弘的祖籍及宗教信仰略考》、周茹燕《〈西洋记〉中的王景弘形象》等一批论文站在人类学考察的视角，阐明了王景弘的祖籍地、个人形象，进一步明确了王景弘在郑和团队之中的角色，在推动郑和研究的同时也确立了王景弘的历史地位<sup>5)</sup>。

## 一 历史书写视域下的王景弘

如果说郑和、王景弘出使西洋的史实探究与地位评价是一个备受学界关注的问题的话，那么，如何探究福建人王景弘的籍贯家世、宗教信仰与文物遗迹，就成为人类学研究的一大问题，也是谜团遍布、亟需探究的一大难题。在此，我们需要梳理一下作为正史的王景弘记载、作为稗史的王景弘传说，从而在这样的正史与野史的“关照”下找到事实真相，把握历史脉络。

作为正史研究，依照《明史》记载，第一次下西洋是为“永乐三年六月，命和及其侪王景弘等通使西洋。将士卒二万七千八百余人，多赍金币。”<sup>6)</sup>《明史》还留下了第七次下西洋的记录，“宣德五年六月，帝以践阼岁久，而诸番国远者犹未朝贡，于是和、景弘复奉命历忽鲁谟斯等十七国而还。”<sup>7)</sup>对此，《明宣宗实录》也予以佐证，即“兹特遣太监郑和、王景弘等，赉诏往谕，其各敬顺天道，抚辑人民，以共享太平之福。”<sup>8)</sup>提示了第七次下西洋的目的，即郑和、王景弘远赴诸番国，奉命诏谕，维持了朝贡体制。

2) 龙岩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龙岩年鉴》，方志出版社，2006年，第329页。

3) 漳平市王景弘研究会，《王景弘研究》，海洋出版社，2019年。

4) 陈贞寿，《纵横驰骋越重洋——郑和王景弘七下西洋》，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8年。

5) 王晓云，《王景弘的祖籍及宗教信仰略考》，《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06期。

6) 《明史》卷304，《郑和传》，中华书局，1974年，第7766-7767页。

7) 《明史》卷304，《郑和传》，中华书局，1974年，第7766-7767页。

8)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明实录19·明宣宗实录》卷67，上海古籍书店，1983年，第1576页。

《明史》记载的郑和下西洋与王景弘的事迹，也得到来自民间人士的稗史记载的佐证。明郎瑛《七修类稿》卷十二《三保太监》记载了第二次下西洋的事迹，即“永乐丁亥，命太监郑和、王景弘、侯显三人往东南诸国，赏赐宣谕。”<sup>9)</sup> 明费信著述的《星槎胜览》也记载了第三次下西洋的盛况。“永乐七年己丑，上命正使太监郑和、王景弘等统领官兵二万七千余人，驾使（驶）海舶四十八号，往诸番国开读赏赐。”<sup>10)</sup> 在此，王景弘也是位列正使地位。明陆容《菽园杂记》则记载：“永乐七年，太监郑和。王景弘、侯显等，统率官兵二万七千有奇，驾宝船四十八艘，赍奉诏旨赏赐，历东南诸蕃，以通西洋。”<sup>11)</sup> 记载民间信仰天妃妈祖的《天妃显圣录》一书亦留下了郑和第五次下西洋的故事。“永乐十五年，钦差内官王贵通、莫信、周福率领千户彭佑、百户韩翊、并道士诣庙，修设开洋清醮。”<sup>12)</sup> 永乐十九年（1421年），王景弘与郑和第六次下西洋。《天妃显圣录》亦加以记载：“本年，太监王贵通等又奉命往西洋，祷祝显应。”<sup>13)</sup> 这样的记载得到了不少民间史料的论证。明朝编撰的《卫所武职选簿》一书还记载了郑和与王景弘第四次下西洋，尤其是王景弘、王真父子参与协助平息苏门答腊内战的故事<sup>14)</sup>。

不过，与如今流传的郑和七下西洋不同，郑和在第七次航海途中逝世于古里，王景弘则是接替郑和率领船队返回祖国，而后在宣德九年（1434年）再度出使苏门答腊国。依照《明史·苏门答刺传》的记载：“宣德九年，王弟哈利之汉来朝，卒于京。帝悯之，赠鸿胪少卿，赐诰，有司治丧葬，置守冢户。时景弘再使其国，王遣弟哈尼者罕随入朝。”<sup>15)</sup> 《明英宗实录》记载，宣德十年（1435年）夏四月，“癸卯，命苏门答刺国王宰奴里阿必丁男阿卜赛亦的嗣为国王先是以公务遣中官王景弘往其国。”<sup>16)</sup> 由此可见，较之郑和七下西洋，王景弘再次出使苏门答刺，是明初唯一的八下西洋的使者。

事实上，正如《明史》记载所言，成祖在位期间，“锐意通四夷，奉使多用中贵。西洋则和、景弘，西域则李达，迤北则海童，而西番则率使侯显。”<sup>17)</sup> 明费信《星槎胜览》亦记载：“太宗文皇帝继统，文明之治格于四表，于是屡命正使太监郑和、王景弘、侯显等，开道九夷八蛮，钦赐玺书礼币。”<sup>18)</sup> 费信在郑和使团中担任通事教谕，撰写了游记《星槎胜览》，也彰显出成祖皇帝雄才大略，扬威德于域外，开蛮夷、通西洋、树国威于新域，推文明于天下的历史功绩。但是在此，这样的正史、稗史的记载也留下不少疑点：第一，就是以王景弘的籍贯为焦点，如何探究王景弘在福建漳州的问题。第二，就是如何站在人类学的立场进一步考察研究王景弘在泉州，尤其是建造船只、出行祭祀的系列问题。基于此，如何把握与评价王景弘这一人物，确立东西文明交流背景下的王景弘的存在价值与历史地位也成了一大问题。

9) 郎瑛，《七修类稿》卷12，《三保太监》，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第124页。

10) 费信，《星槎胜览》，中华书局，1954年，第1页。

11) 陆容，《菽园杂记》卷3，中华书局，1985年，第26-27页。

12) 陈学霖在《明王景弘下西洋史事钩沉》（福建省国际文化经济交流中心、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漳平市委员会编，《明代大航海家王景弘》，漳平市文史委出版，2003年，第116页）中论证太监王贵通即王景弘。

13) 周茹燕，《〈西洋记〉中的王景弘形象》，《王景弘研究》，海洋出版社，2019年。

14)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辽宁省档案馆编，《中国明朝档案总汇 第二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

15) 《明史》卷325，《外国列传六·苏门答刺传》，中华书局，1974年，第8421页。

16) 《明英宗实录校勘记》卷4，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1983年，第83页。

17) 《明史》卷304，《宦官列传》，中华书局，1974年，第7768页。

18) 费信撰，冯承钧校注，《星槎胜览校注》，序，商务印书馆，1938年，第11页。

## 二 王景弘在漳州

探究王景弘在福建的第一个疑点，就是籍贯与族系的问题。承前所述，《明史》未列“王景弘”条目，故而王景弘究竟来自福建何处，何时擢升太监，可谓是史料匮乏，无从知晓。不过，依照后世记载，我们也可以找到一点线索。

首先，作为王景弘籍贯的最早记载，可以提到《宁洋县志·中官》（康熙三十一年版）。该书记载：“王景弘，集宁里人，明永乐间随太宗巡狩有拥立皇储功，恩赐嗣子王祯，世袭南京锦衣卫正千户。”<sup>19)</sup> 这一记载提到“集宁里人”，也就是籍贯之所在。该书较之张廷玉编修《明史·郑和传》早了四十七年，可谓是最早记载了王景弘籍贯的所在。不过就此再度参阅地方志，即《漳州府志·武勋》的记载，“王景弘，集贤里香寮人，从太宗北征，后有拥立功，授其子宁南京锦衣卫正千户。”<sup>20)</sup> 在此出现了不同于“集宁里”的“集贤里香寮人”这一记载。历史上，明隆庆元年（1567年）设立宁洋县之后，“集贤里”就改称为“集宁里”。王景弘曾跟随太宗，即明成祖朱棣巡狩天下，拥立皇储，后世袭南京锦衣卫正千户。——事实上，《明英宗实录》记载了王景弘负责南京水军操练的事迹，“请以各卫风快船四百艘作战船，令都督陈政总督操江。上敕守备太监王景弘及襄城伯李隆少保兼户部尚书黄福等计议行之。”<sup>21)</sup>

不过，我们亦需要考证疑案，即“集宁里（集贤里）”究竟在何处，也就是王景弘的籍贯究竟在何处。历史上，这一问题亦得到后世学者的关注。依照清嘉庆年间蔡永兼著述的《西山杂志·四监通异域》记载，“王景弘，闽南人。雇泉州船以东石沿海名导引，从苏州浏家港入海，至泉州寄泊。”<sup>22)</sup> 这一段记载极为笼统地提到了王景弘为闽南人，将重点落实在了王景弘是如何自江苏到福建，组织团队的故事，提到了王景弘熟识沿海航路，以操舟为任务，而后成为郑和下西洋的主干人员的潜在背景。这一记载也得到了来自地方志的佐证。依照《龙岩州志》记载：“王景弘，龙岩集贤里人，后分属宁洋，永乐间随太宗巡狩，有拥立皇储功，赐嗣子王祯世袭南京锦衣卫正千户。”<sup>23)</sup> 在此，“集贤里”这一称谓基本可以确定，且落实在了“龙岩州”，也就是来自龙岩。

围绕王景弘籍贯最为详细的记载，则是出自民国初期毅轩斋主人著述的《毅轩杂志》。毅轩斋主人，名为陆树藩（1868-1926年），字纯伯，号毅轩，专研书画、版本目录之学。依照该书中卷十三《名使录·王景弘》记载，王景弘生于洪武四年辛亥十月丁卯，字琛琳，晋江人。后随父徙漳。景弘幼聪慧，工诗词，谙熟梵文蕃语，还擅少林拳，善正骨，为人颇具豪气。由此而落实了“籍贯晋江”一说。不仅如此，该书还记载：“宣德九年，又出使苏门答腊。是年十月初七，景弘为救溺水之爪哇土著，不幸捐躯，终年六十三岁，葬爪哇国三宝村。”<sup>24)</sup> 即王景弘为了救人而捐躯，埋葬于爪哇，土民立庙祀之，称曰大明帝国钦差王副总兵的故事。不过，这一论断究竟来自何处，实在难以佐证，或许不过只是来自东南亚的海外传言而已。

19) 转引自朱明元等编，《王景弘与郑和下西洋》，天马图书有限公司，2004年，第237页。

20) 罗青霄等，万历年《漳州府志》卷31，影印万历年原刊本，第18页。

21) 《明英宗实录校勘记》卷6，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1983年，第122页。

22) 蔡永兼，《西山杂志·四监通异域》，晋江县图书馆藏稿本。转引自庄为玘《明下西洋郑和，王景弘梁正使的卒事考》，载南京郑和研究学会编，《郑和研究论文集》，大连海运学院出版社，1993年，第485页。

23) 张铤球等，乾隆《龙岩州志》卷10，《人物上·中官》，福建省地图出版社，1987年，264页。

24) 转引自王晓云，《王景弘的祖籍及宗教信仰略考》，《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6期，第258页。



针对王景弘的籍贯是否就是来自龙岩的“疑问”，漳平市旅游局局长曹木旺、漳平市博物馆馆长罗宣生进行了实地考察，为此而撰写了《王景弘籍贯考略》一文。依照曹木旺的考证，王景弘的籍贯不是泉州晋江，而是福建漳州香寮村许家山自然村人<sup>25)</sup>。为此本课题组进行了再度确认，就此也不得不继续提出“疑问”之所在。



图1：香寮村王景弘塑像



图2：香寮村王景弘纪念馆内的郑和王景弘像



图3：香寮村王景弘庙

所谓“疑问”，就是留下了王景弘遗迹的第二个村落，即漳州鸿渐村的围绕王景弘举行祭祀的问题。为此，课题组也采取人类学考察的方法，就王景弘与地方祭祀，也是王景弘在漳州这一问题进行了调研。

首先，就是作为祭祀空间的漳州龙海角——鸿渐村。鸿渐村古称鸿渐尾，地处九龙江水口古月港北岸，是闽南入海的港口码头之一。据界碑记载：鸿渐尾，原名“鸿渐尾港，东至佛头港湾”。根据厦门市文史专家陈延杭的研究，中国最早的郑和庙就坐落于此<sup>26)</sup>。郑和庙亦称“二位太保庙”，始建年代不详，该地原属泉州府同安县，后划归龙海。旧庙在文革之中被毁，菲律宾侨胞许文忠于1986年捐资重建。庙门匾额书“二位太保”，两侧对联：“著千古之功勋职封太保，济万民乎黎庶德重风山”。庙内供奉郑和、王景弘的两尊坐像，大小基本一致，宽约70公分，长约1.5米，戴太监帽，着红袍，手持鲜花；右边为黑脸——郑和，左边

25) 曹木旺，《王景弘籍贯考略》，《“睦邻友好”郑和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02年。

26) 陈延杭，《国内第一座郑和庙的考察》，《海交史研究》，1990年02期。

为红脸——王景弘，背壁绘龙王吐珠图，保佑人们航海平安。



图4：鸿渐村太保庙



图5：太保庙石碑

其次，鸿渐村的祭祀活动，大概一年集中在两次，一次是每年农历八月廿三日，传闻为郑和生日，亦称为“华侨节”，为纪念郑和的功德恩惠而举行；一次是每年正月十五元宵节，村民隆重奉祀“太保公”，以祈祷婚姻美满，家庭幸福。换言之，鸿渐村的重点在于郑和，而不在于王景弘，且与远洋航行保持了紧密联络。不过值得一提的是，作为鸿渐村的分灵祭祀，台湾云林县北港镇二百多年前建立了“侯天府庙”，以“郑府圣侯”为崇拜主神。鸿渐村《许氏族谱》记载，鸿渐村许姓祖先曾携带一尊“郑府圣侯”塑像抵达台湾，而后于云林县北港镇建立了祀奉郑圣侯的古庙，而“太保公”（即郑和）曾封号“郑圣侯”，故而该镇古庙实为福建漳州龙海鸿渐村“郑和庙”的分灵祭祀之场所<sup>27)</sup>。由此可见，鸿渐村尽管不是王景弘的籍贯之所在，但却是郑和、王景弘的信仰传播到海外的最早的“港口”之所在。

### 三 王景弘在泉州

宋元时期，泉州以兴盛发达的造船业与航海人才荟萃之地而跻身于世界最大港口之一。探究王景弘在泉州这一主题，依据《明史·食货志》记载：“（永乐）三年（1405年），以诸番贡使益多，乃置驿于福建、浙江、广东三市舶司以馆之，福建曰来远、浙江曰安远、广东曰怀远。”<sup>28)</sup>作为宋代闽茶出口的重要中转站，泉州港成为安溪铁观音、闽北乌龙茶、红茶的集散地。不仅如此，福建“德化瓷”也极为著名，成为远销海外的重要物资。这一点得到了清道光《晋江县志》的论证：“明永乐五年（1407年），以出使西洋太监郑和奏令福建守镇官重新其庙（笔者注：泉州天妃庙），自是节遗内官及给事中行人等官，出使琉球、暹罗、

27) 陈延杭，《国内第一座郑和庙的考察》，《海交史研究》，1990年02期，第85页。

28) 李洵，《明史食货志校注》，中华书局，1982年，第252页。



爪哇、满刺加等国，率以祭告祈祷为常。”<sup>29)</sup> 蔡永兼《西山杂志》则明确了时间，即永乐十年（1412年），王景弘受命到闽、浙沿海，招募大批水手和造船工匠，进而在太仓、长乐、福州、泉州等地督练水师、监造海船、修建天妃宫的历史事实。不过由此，也衍生了王景弘在福建的第二个疑点，即王景弘的泉州行迹究竟如何？

首先，我们可以探究郑和下西洋的物资来源，追溯一下安溪湖头古渡口的历史。明嘉靖《安溪县志》记载：“湖头市，在感化里，百货所骤，号‘小泉州’。”<sup>30)</sup> 清康熙《安溪县志》记载，湖头“上达漳、汀，下连兴、泉，商旅所至，舟车所通，诚为辐辏。民之环住其间者，绣错不绝，烟火相接，一带市肆，倍于邑内，土风文物，非别里所得而班也”<sup>31)</sup>。作为福建茶的故乡之一，安溪古渡口成为茶叶自安溪中转泉州，进而输出海外的一大见证。



图6：大使公宫旁古渡口

湖头至泉州的水路九曲十八弯，极为艰难。明正统年间（1436-1449年），湖头李氏家族六世祖李森——清朝名臣李光地（1642-1718年）之先祖，清康熙帝曾赐予“急公尚义”的匾额——开凿险滩巨石，疏浚渊港险滩，令湖头至泉州水路得以畅通发达，湖头古渡口由此也迅速成为闽南地区的一个重要商品集散地。不过，为了祈求渡运安全，福建人在此建起了清溪宫（奉保生大帝）、大使公宫（奉郑和与王景弘）、关帝庙（奉关羽）、惠泽庙（文天祥、陆秀夫、张世杰，称“三官尊王”，康熙皇帝敕封“三官大帝”）等不少庙宇，在船工起航之前和抵达之后，均到庙宇虔诚烧香、祷告，祈求神明佑护。

第二，作为人类学考察的成果之一，探究王景弘在泉州的第二个行迹，就是“大使公宫（济川宫）”，雅称“清川宫”。该宫庙始建于明景泰至弘治年间，是安溪境内唯一的供奉郑和、王景弘的庙宇。如今的大使公宫朝向溪背街，建筑面积不足10平方米，行制简朴、破败坍塌。根据《安溪寺庙大观》记载：“（该宫）奉郑和与王景弘为神，尊称为‘大使公’。”<sup>32)</sup> 宫庙正门题刻对联：“大浪曾东去帆引海风百里顺，使舟何日

29) 福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主编，《晋江县志（上）》卷16，福建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429页。

30) 嘉靖壬子《安溪县志》卷1，国际华文出版社，2002年，第103页。

31) 康熙癸丑《安溪县志》卷12，出版者不详，2003年，第255页。

32) 凌文斌，《安溪寺庙大观》，海风出版社，2007年，第138页。

归橹摇山月一清溪。”宫内左侧立“征信重建碑记”，记载：“济川宫，又名大使公宫，位于泉州往湖头繁荣水路船巷的古码头。始建明朝，是纪念郑和下西洋的庙宇，早期香火鼎盛，后历年久失修倒塌。今逢盛世，由叶仲实向社会热心人士募捐重建使得庙宇焕然一新。（中略）募资人：叶仲实 公元二〇〇五年岁次乙酉年桂月”。湖头“大使公宫”成为郑和、王景弘路经泉州的重要史迹，也成为湖头参与古代“海上丝绸之路”海外贸易的光辉见证。

与漳州龙海鸿渐村的庙宇不同，大使公宫——济川宫供奉三尊神像，中间主佛高约60厘米，宽约25厘米，红脸络腮黑须，头戴金冠，身着红底金色纹蟒袍，怒目圆睁，威严肃穆。左边副佛高约55厘米，宽约15厘米，红脸络腮黑须，头戴金冠，形态与主佛相仿，不同之处在于头饰缀有绒球流苏，慈祥瑞庄，身披红布，上书“济川宫大使尊王”。右侧副佛高约50厘米，宽约15厘米，为一尊金色关公像，身披红布，基座留下“关帝圣君 忠勇护家 信义招财”的字样。由此可见，作为2005年重修的庙宇，该庙神像未按照郑和、王景弘的形象来加以塑造，而只是保留了犹如“习合”的综合性信仰，也突显出这一村落的历史变迁。



图7：济川宫大使尊王像（左边副佛）



图8：大使公宫神像

第三，考证王景弘在泉州的基本行迹，或许可以依照《郑和航海图》，原名《自宝船厂开船从龙江关出水直抵外国诸番图》，由此来截取泉州这一部分来加以探究；或许也可以依照郑和在泉州的事迹来加以追溯；或许还可以通过《天妃灵应之记碑》来加以映证。不过，作为与郑和同处于“正使”地位的人物，王景弘在泉州的行迹可谓是散落在了泉州的妈祖祭祀活动、招收福建船工的晋江深沪三宝街遗址之中。

依照集美航海学校珍藏的《宁波温州平阳石矿流水表》记载：“永乐元年，奉旨差官郑和、李愷、杨敏等，出使异域，弓往东西二洋等处，开输贡累累，较正牵星图样，海岛、山域、水势图画一本，务要选取能识山形水势，日夜无歧误也。”<sup>33)</sup>历史上，郑和与王景弘自福建长乐启航，出闽江口五虎门，进入台湾海峡，而后才乘东北季风出使西洋。在这一过程中，泉州灵山圣墓留下了“郑和行香碑”，上刻：“钦差总兵

33) 郑鹤声、郑一钧编，《郑和下西洋资料汇编》下册，齐鲁书社，1989年，第253页。



太监郑和，前往西洋忽鲁漠斯公干，永乐十五年（1417年）五月十六日于此行香，望圣灵庇佑。镇抚蒲和日记立。”<sup>34)</sup> 地方官蒲日和为之勒碑为记，是为《重修温陵圣墓碑记》。作为世代伊斯兰教的教徒，郑和祭祀的目的是为了向真主祈祷护佑，或者是为了向阿布·依斯克道进贡祈风。

作为招募水手的重要基地，滨海港口晋江的深沪镇三宝街也留下了不少郑和、王景弘的行迹。三宝街附近的水月井、池边的马饮石槽，尤其是清朝时期就确定下来的三宝街，皆打下了郑和的烙印。不过，若是我们联想到印尼三宝瓏、泰国三宝港、马来西亚马六甲三宝城等一系列以“三宝”而命名的地区，或许就难以辨明孰先孰后。如今泉州海交馆还留下了郑和船队遗留下来的碇木，也就是控制船锚的木柄。泉州开元寺古船陈列馆也留下了郑和西洋船队的遗物——明代四爪铁锚。正如《明史》记载：“将士卒二万七千八百余人，多赍金币。造大舶，修四十四丈、广十八丈者六十二。自苏州刘家河泛海至福建复自福建五虎门扬帆，首达占城，以次遍历诸番国，宣天子诏，因给赐其君长，不服者以武慑之。”<sup>35)</sup> 郑和团队下西洋的声势之浩大、人员之众多，而今却只留下残存的行迹，不得不令人唏嘘。

## 结论

宣德九（1434）年，郑和逝世之后，王景弘再度奉使西洋。对此，依据《明史》记载：“宣德九年，王弟哈利之汉来朝，卒于京。帝悯之，赠鸿胪少卿，赐诰，有司治丧葬，置守冢户。时景弘再使其国，王遣弟哈尼者罕随入朝。”<sup>36)</sup> 或许是感念王景弘航海技术之娴熟，统领庞大船队出航之气魄，亦佩服遍历海外、访问各国之功勋，明宣宗为之撰写了长诗——《赐太监王景弘诗》<sup>37)</sup>。该诗之中，明宣宗对王景弘进行了高度评价：一是表彰王景弘忠于皇帝之命，摩曳驱役，遍历岛屿，不辞辛劳；二是赞誉王景弘奉使海外，安抚百姓、劝阻武力，推崇中华教化；三是勉励王景弘长期行涉，借助魏晋诗人陆机“尔庸”一语，将之比喻为“明德允迪”的君子。

与这样的来自明宣宗的“君子”评价不同，站在实证研究的视角，学者郑一钧指出：“在下西洋出国之前，王景弘重点负责船舶的征集、航海技术人员的甄选、航海针路的确认等一系列准备工作。在驶往各国的远洋航行中，王景弘与郑和共同肩负指挥船队前往各国访问的重任，与郑和共同完成了下西洋的各种使命。”<sup>38)</sup> 换言之，王景弘的重要价值就在于作为“正使”与作为“技术者”的身份认同。不过，站在当下流行的“一带一路”战略与福建这一主题，梳理王景弘研究的新动向，或许我们通过深入“王景弘在福建”这一主题，进一步找到历史与当下、东方与西方的结合点，找到历史学与人类学的贯通之处。

34) 泉州市人民政府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外国人在泉州与泉州人在海外》，海风出版社，第173页。

35) 《明史》卷304，《郑和传》，中华书局，1974年，第7766-7767页。

36) 《明史》卷325，《外国列传六·苏门答刺传》，中华书局，1974年，第8421页。

37) 明宣宗《宣庙御制总集》，转引自郑鹤声、郑一钧，《郑和下西洋资料汇编》中册（下），济南：齐鲁书社，1983年，第857页。

38) 郑一钧，《论王景弘的历史功绩》，《王景弘研究》，海洋出版社，2019年，第18页。

